



他乡有夫子： 西方《孟子》研究与儒家伦理建构

Mencius in an Alien Land: Western Studies on
Mencius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 Ethics

韩振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他乡有夫子： 西方《孟子》研究与儒家伦理建构

Mencius in an Alien Land: Western Studies on
Mencius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 Ethics

韩振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乡有夫子：西方《孟子》研究与儒家伦理建构 / 韩振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203-0593-8

I. ①他… II. ①韩… III. ①孟轲（前372～前289）—人物
研究②儒家—研究 IV. ①B222.55②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2988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2.25

插页 2

字数 401千字

定价 9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导论 研究缘起	(1)
一 从“门修斯”说起	(1)
二 “西方”的意义	(3)
第一章 夫子徂西初记	
——《孟子》在西方的早期接受 (1593—1754)	(6)
一 来华耶稣会士及其对手——两种释《孟》立场的莫立	(6)
二 孟子附属于孔子的多层原因	(10)
三 卫方济的《孟子》译本及其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合流	(13)
(一) “礼仪之争”氛围中的卫方济《孟子》译本	(13)
(二)《孟子》的“升格”及其对沃尔夫的影响	(15)
附一 启蒙的先声：儒学在德国的接受	(22)
附二 文化—文本的交织	
——儒家经典如何成为欧洲哲学的思想源泉	(48)
第二章 19 世纪新教传教士的《孟子》诠释	(56)
一 新教传教士之《孟子》译介——走向大众	(56)
二 朝觐东方？——理雅各的《孟子》译介及其影响	(59)
三 花之安：人性、伦理学与国家学说	(64)
四 辩异与求同：宗教比较视域	(68)
五 小结	(70)
附一 从雷慕沙到儒莲、卜铁：欧洲学院派汉学的基调	(71)
附二 顾赛芬的法语、拉丁语双语译本	(75)
第三章 1900 年以来《孟子》主要译本摭谈	(76)
一 1900—1989 年重要译本之勾勒	(76)

2 他乡有夫子

- 二 1990 年以来重要译本之勾勒 (83)
 - 甲 海外汉学家之西译《孟子》 (83)
 - 乙 国内学者之英译《孟子》 (86)

第四章 1900 年以来专业研究的多维展开 (88)

- 一 1900—1989 年专业研究诸面相 (88)
- 二 1990 年以来的研究视野与方法 (105)

第五章 预设与关怀

- 1990 年以来西方《孟子》研究的问题意识 (122)
- 一 孟子与现代民主、人权 (122)
- 二 孟子人性论的文化性与生物性之争 (127)
- 三 德性伦理与角色伦理之争 (130)

第六章 从宗教辩难到哲学论争

- 西方汉学界围绕孟子“性善”说的两场论战 (133)
- 一 性善、“良知”与“道德主体”：理雅各对巴特勒、
孟子的会通 (134)
 - (一) 依经立论：理雅各的“狐假虎威” (135)
 - (二) 理雅各和巴特勒的悖论 (137)
- 二 19 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对孟子“性善”说及理雅各会通
做法的非议 (138)
 - (一) 信仰之别：要“性善”还是要“恩典” (139)
 - (二) 早期传教士的渊源：耶稣会与多明我会的分歧 (141)
- 三 20 世纪末美国汉学中的孟子“人性”论争 (143)
 - (一) 安乐哲：“性”非本质 (143)
 - (二) 华霭仁：生物学意义之“性” (144)
 - (三) 价值之分：要普遍的自由、人权还是相对的社群 (145)
- 四 小结 (146)

第七章 早期儒家与德性伦理学：儒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话题

- 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147)
- 一 西方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及其向儒家伦理的延伸 (147)
- 二 安乐哲、罗思文等学者对此一路向的非议与商榷 (148)

三 早期儒家与德性伦理之内在关联	(150)
四 事实与立场：安乐哲新实用主义之局限	(151)
(一) 自我指涉与理论限域	(152)
(二) 文化相对主义 vs. 普遍主义	(155)

第八章 “批判理论”如何穿越孟子伦理学？

——罗哲海的儒家伦理重构	(157)
一 “批判理论”视野中的孟子伦理学	(158)
(一) “轴心时期”的孟子伦理学	(158)
(二) 对李耶理、信广来孟子论著的评论	(160)
(三) 人权论域中的孟子	(162)
二 “一般风景，两样心情”——罗哲海与朱利安之分歧	(164)
(一) 朱利安的“迂回与进入”	(165)
(二) 罗哲海与朱利安的同与异	(166)
三 小结	(169)

【本章附录】

“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汉语哲学建构

——欧美汉学界对于先秦中国思想的不同解读	(171)
导论 西方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	(171)
一 从“语言学说”讲起——陈汉生的汉语哲学认识	(174)
二 罗哲海之陈汉生批判及其对“轴心时期”中国思想的 现代重构	(190)
三 小结：分歧与弥合	(202)

第九章 孟子是个讲“逻辑”的人吗？

——西方汉学的视角	(203)
一 问题的提出：孟子是个讲逻辑的人吗？	(203)
二 专业汉学奠基之时的“共识”	(205)
三 批评的分野	(208)
四 论锋又起：陈汉生及其反对者	(215)
五 小结：哲学与信仰之间的孟子	(220)

附录一 “学术对话与访谈”五则

壹 “孟子也是我们老外的祖先”——与齐思敏教授谈孟子	(222)
----------------------------------	-------

4 他乡有夫子

贰 占以明《易》理 象以喻《孟》《庄》——与叶格正博士

谈汉学 (226)

(一) 三百年前的《孟子》译本 (226)

(二) 孟子在今天并未过时 (229)

(三) 《易经》的价值 (233)

(四) 汉学：中国与西方 (235)

叁 轴心时期的儒学启蒙——与罗哲海教授谈汉学 (238)

(一) 破除“Universismus”的陈词滥调 (239)

(二) 理解孟子人性论的路径 (241)

(三) “儒学”与“儒教”之争 (244)

(四) 哲学家的问题意识 (247)

(五) 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实用主义 (249)

(六) 国家主义、政治儒学与精英政治 (252)

(七) “古今之争”与轴心时期的儒学启蒙 (253)

肆 “当代汉语哲学”的建构——与何乏笔博士谈哲学与

汉学 (257)

(一) 哲学思考经历与学术兴趣 (258)

(二) 当代哲学问题与“当代修养哲学”的建构 (260)

(三) “修养”的“政治性” (264)

(四) 港台中国哲学研究的进展 (268)

(五) 庄子思想对于民主政治的意义 (271)

(六) 当代汉语哲学的跨文化性及其发展前景 (273)

伍 人权论域中的《孟子》诠释——Gregor Paul 访谈 (276)

附录二 参考文献 (287)

壹 西文著作（含博士学位论文；依出版年代排序） (287)

贰 中文及汉译著作 (306)

叁 其他相关著作 (307)

肆 西文论文、书评（依发表时间先后排序） (308)

伍 中文论文、书评（含学位论文；依发表时间先后排序） (340)

后 记 (345)

导论 研究缘起

一 从“门修斯”说起

1998年，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的《民族国家与暴力》（*The Nation - State and Violence*）一书出版了中译本，译者将原书中的 Mencius 直译为“门修斯”，由此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译界笑话。Mencius 本是西方学界对中国古代儒家亚圣孟子的通用译名，何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让国内读者陌生不闻的“西方”贤圣，着实有点匪夷所思。

然而，倘若暂且抛开此事不论，拿“Mencius”这个名号随便去问一般的读书人，恐怕一眼认出他就是孟子的人也不会很多。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为什么西方学界翻译其他中国古代圣贤多用音译（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或汉语拼音），唯独对孔子、孟子二人采用约定俗成的 Confucius、Mencius 译名^①？还有，如果说我们对孔子的西译名 Confucius 还算熟悉的话，那么我们何以对孟子的西译名 Mencius 如此陌生？

确实，如果与《周易》《论语》《老子》《庄子》《孙子兵法》等中国经典相比，作为儒家的经典文献之一，《孟子》在西方的传播、流布并没有得到我们充分的重视。这表现在前者在西方的传播情况国内学界已有不少论著大书特书，而对于《孟子》的西方“游历”，至今却鲜有论及^②。但缺少关注并不等于说这个问题本身不重要。从译介的角度看，前有

① 西方也偶有将墨子译为 Micius，将列子译为 Licius 的例子，但这些译名并不通行。

② 《孟子》在日、韩等亚洲近邻国家的接受情况，黄俊杰等先生已有著作论及，如《东亚儒者的〈四书〉诠释》等论著。而西方学者对“《孟子》在西方”这一话题倒有些许关注，为笔者所见的有：Donald F. Lach（劳端纳），Edwin J. Van Kley: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ume III: A Century of Advance* (Book 4 East Asia,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此书在介绍欧洲人初识中国人的“智识生活”（intellectual life）时，（转下页注）

1593 年罗明坚 (Michael Ruggieri)、利玛窦 (Matteo Ricci), 中间经过卫方济 (Francis Noël), 后有 1824 年儒莲 (Stanislas Julien), 他们都以拉丁文翻译过《孟子》, 之后欧美对于《孟子》的译介和接受就从未中断过。仅在英语世界, 先后就有柯大卫 (David Collie)、理雅各 (James Legge)、翟林奈 (Lionel Giles)、赖发洛 (Leonard A. Lyall)、魏鲁男 (James R. Ware)、韦利 (Arthur Waley)、翟楚 (Ch'u Chai) 与翟文伯 (Winberg Chai)、杜百胜 (W. A. C. H. Dobson)、刘殿爵 (Dim Cheuk Lau)、亨顿 (David Hinton)、华道安 (Donald B. Wagner)、贾德讷 (Daniel K. Gardner)、万白安 (Bryan W. Van Norden)、华霭仁 (Irene Bloom) 等十几个译本 (全译或选译)。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孟子在中国儒学史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 他一反孔子不言“性与天道”的做法, 转而辩“性善”、言“天命”, 为以实用理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开辟了一条新路。或许正是孟子学说的这一“形而上”倾向, 使得他在西方“爱智”的哲学传统中备受青睐, 已经成为一个聚讼纷纭的“箭靶式”人物。尤其 20 世纪中叶以来, 围绕着孟子的“心性”论, 葛瑞汉 (Angus C. Graham)、倪德卫、安乐哲 (Roger T. Ames)、华霭仁、陈汉生 (Chad Hansen)、艾文贺 (Philip J. Ivanhoe)、伊若泊 (Robert Eno)、江文思 (James Behuniak) 等海外汉学学者展开了细致而有成效的争论与探讨, 并吸引了华裔学者柯雄文 (Antonio S. Cua)、杜维明、刘述先、黄百锐 (David B. Wong)、信广来、刘秀生、姜新艳、陈宁等人的参与。此外, 更有汉学家将孟子思想与西方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 并探讨孟子思想之于现代社会的世界性意义。

笔者以为, 在中学、西学日益互动的今天, 倘若有人关注包括《孟子》在内的古典儒学资源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那么“孟子在西方”便是一个绕不开的题目。因此, 对《孟子》在西方的译介与接受情况展开研究, 应是一项富于创新意义而且具有迫切性的研究课题。

(接上页注) 提到过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如何进入欧洲人的视野之中; 倪德卫 (David S. Nivison): 《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The Ways of Confucianism: Investiga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 万白安编; 芝加哥: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此书第 12 章讨论了《孟子》的几个西译本。2010 年夏天笔者在波鸿大学拜访汉学家罗哲海 (Heiner Roetz) 教授时, 得知他跟其他几位教授合作主持了一项题为 “The book Mencius in the context of human rights issue: Milestones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text in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的课题研究, 形成了 800 多页的研究成果, 目前书稿已出版。

二 “西方”的意义

“他乡有夫子——欧美的《孟子》译介与诠释研究”^①这一课题考察儒家经典《孟子》自近现代以来在欧美国家的翻译、介绍、研究情况，并将这一过程置于西人的经典诠释语境中，剖析且“解码”其诠释意图、诠释策略与方法、正读与误读缘由，讨论欧美“西学”与“海外汉学”之间的双向互动，进而思考西方“孟学”对于国内学界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属于“西方汉学”(sinology)的范畴。“西方”之谓，并非在政治学意义上立论，而主要以文化地理为畛域，包括欧美诸国在内。西方汉学与传统国学渊源不同，文脉有异，笔者将“西方的《孟子》译介、诠释”作为研究对象，并非仅仅出于知识学的兴趣，更不是为了“挟洋自重”，而是基于笔者对学术语境的一个根本判定。亦即，自近世“大航海时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中西之间文化学术的交流日益频繁，这使得《孟子》乃至中国古典哲学的当代诠释变成一项“跨文化”的事业。这一跨文化的问题意识与学术眼光，赋予哲学对话以新的可能，而《孟子》和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潜能借由哲学对话不断得以开显。具体而言，关注“西方的《孟子》译介、诠释”，其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从宏观视角看，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也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海外汉学或中国学研究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创建和谐的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它集中了研究与阐述中国人文学术的世界性智慧，是中国人文学术走向世界之林的不可或缺的重大资源库，是中国了解世界如何观察中国的窗口之一，也是树立中国国际形象的深层次文化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当前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对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并参与正在进行的世界文化建构，在新的世界文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此，必须了解、分析中国文化经典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及其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一方面总结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独特理解，包括误读

^① 本书标题中的“他乡有夫子”一语，最早是由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他乡有夫子：史华慈生平与学术谱略》（《世界汉学》2003年第2期）。后来张西平教授在他编写的有关汉学研究的书中借用了这一说法：《他乡有夫子——汉学研究导论》（上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特此说明。

和曲解,分析其文化根由,达到对话交流,互相为用的目的;另一方面,将之作为他者,在比较和参照中来反观和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经典的特点。在国家注重发展文化“软实力”、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大背景下,“他乡有夫子——欧美的《孟子》译介与诠释研究”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目标提供思想与实践借鉴,显然有其现实意义。

其次,关于《孟子》在欧美的译介、研究,国内学界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国内学界对《孟子》西传问题的关注近年虽陆续增加,但远谈不上全面和深入。据笔者掌握的资料,除了2014年杨颖育出版的《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之外,国内学者主要在西方学者译介《孟子》的个别问题上有零星关注。其中得到最多关注的是理雅各的《孟子》英译本,如楚至大《难能可贵与美中不足——评理雅各两段〈孟子〉的译文》(1995)、余敏《从理雅各英译〈孟子〉看散文风格的传译》(2001)、洪涛《〈孟子〉英译所涉及的字义问题和文化问题》(2002)、陈琳琳《理雅各英译〈孟子〉研究》(2006)、张静《理雅各〈孟子〉翻译研究》(2008)、吴志刚《准确理解原作是典籍英译的关键——理雅各英译〈孟子〉指瑕》(2009)、杨颖育《百年〈孟子〉英译研究综述》(2010)、《儒家典籍英译及阐释的转换与失落——以英语世界〈孟子〉为例》(2011)、唐文璐《被操控的主体:以理雅各译介〈孟子〉为例》(2012)等论文从译介准确性角度做出过评论。评鹭译作的信息等值性当然是一项必需的基础性工作,但是,因为部分论者往往缺乏哲学和思想史素养,所论拘囿于字句短订之对检,遂使整个研究显得支离琐屑,不成局面。

另外,关于语义学家瑞恰慈1932年出版的《孟子论心:复式定义的试验》,有胡燕春《瑞恰慈视域中的孟子》(2008)、张蓓《情感语言与〈孟子〉——论〈孟子论心〉》(2012)两篇短文做过绍述。围绕20世纪90年代安乐哲和华霭仁关于孟子人性理论的争辩,杨泽波《性的困惑:以西方哲学研究儒学所遇困难的一个例证——〈孟子心性之学〉读后》,(2007),蔡世昌《比较哲学视域中的孟子“人性”概念——以安乐哲与华霭仁的争论为中心》,(2008)曾撰文评析。后面二文在专题性上有所开拓,但仍不够深入,尤其未能在“知其所以然”方面做出深刻揭示。

从整体上综述《孟子》西传历程的论文,虽然20年前即有王其俊《孟子在国外的影响》(1993)发表,但此文将“孔孟”合于一处来谈,模式老套,谈西方之孟子研究更是没有提供多少新鲜信息。直到2009年,

方有国内学者重新注目于这一问题。姜新《走向欧洲的孟子——译介〈孟子〉的西文图书述略》(2009)、刘单平《〈孟子〉西译史述评》(2010)二文值得一提,不过,论文作者常常依赖二手资料,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等材料,其深度和广度远未达到系统专题研究的层次。国内学者大多依据译回中文的资料,受到译文准确性和时效性的巨大制约(每有一个新的《孟子》西译本问世,在西方往往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书评、讨论跟进,而国内学界对这些书评资料并没有多少关注),往往落入自说自话的境地,无法及时、有效地把握西方研究之真意并与之展开即时对话。

最后,从微观层面来看,正如孟子的理论学说主要借由对话和辩论而展开的一样,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也迫切需要细致的对话和交流。对国外孟学资料的介绍和研究有助于引进不同的理论见解:其一,海外孟学本身即是一种“比较哲学”研究,了解其具体“比较视域”,可以丰富我们对孟子其人其书的认识;其二,本课题将特别关注1990年以来欧美孟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实际上这一部分成果也是最多的),由于其自身研究视野及理论方法的当下性,本课题研究自然会引进很多理论和方法的“生料”,一方面可以改变以往对于西方汉学某些滞后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这一视角也可丰富我们对整个西学的认识;其三,跟国内孟学相比,欧美孟学(尤其是分析哲学家如葛瑞汉、倪德卫等学者的孟学资料)十分重视文本细读,尤其关注孟子本人的思维/论辩方法,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反而有时习焉不察,所以,本课题有点类似于“揽镜自鉴”,而且,这“镜”还不止一面,希望能借此引起我们更多的理论反思和方法自觉。总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本课题所服务的正是一种“知彼”而又“知己”的目标。

需要指出,从事本课题研究最大的困难在于,西方文献涉及的语种众多,笔者将英语世界的《孟子》译介与诠释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于拉丁、德、法、意等语种文献,一方面借助词典阅读或求助于同事、学友中的专家;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英语世界对这些非英语文献的译介、研究与评论材料,以求全面、立体地呈现欧美的孟学历史与现状。

第一章 夫子徂西初记

——《孟子》在西方的早期接受(1593—1754)

考察西方世界对《孟子》一书的接受史，我们首先得把目光投向 400 多年前的“大航海时代”。就在此时，那些发愿献身上帝的耶稣会会士（Jesuits）开始到亚洲、到中国传播基督教^①；也正是从此时起，西人开始接触并了解、介绍儒学，《孟子》亦于此时进入西人的视野。

本章选取从 1590 年代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开始译介《孟子》，到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cis Noël）第一个《孟子》译本出现，并及于卫方济译本对德国启蒙运动主将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的深度影响，全面考察从 1593 年《孟子》节译本出现至 1754 年沃尔夫去世这一阶段《孟子》在西方的接受情况。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本章将重点放在哲学思想史的考察方面，研究并“解码”西人的接受语境、问题意识，以及视域融合的具体表现，并尝试做出自己的价值评判。尽管《孟子》在西方的这段早期接受史已经成为过去，但梳理并厘清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认识西方在专业汉学（学院汉学）之前对于《孟子》乃至整个儒学的理解方式，探究专业汉学与传教士汉学之间在思想和思维上的深刻关联，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另外，通过“揽镜自鉴”，可以丰富我们对于孟子其人其书的认识，并引起我们更多的理论反思和方法自觉。

一 来华耶稣会士及其对手

——两种释《孟》立场的奠立

从历史上看，文化间的交流未必都是双向的，而往往表现出某种

^① 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中“基督教”均泛指 Christianity，而不是基督新教。

“势差”，即水平较高的文化会流向并影响水平较低的文化，而不是相反的。古罗马文化之征服欧洲大陆，基督教之征服非洲，大抵如此。中西文化在明末清初时的碰撞，尽管肇端于负有传教使命的来华传教士，但其效果却是中西方的相互注视与了解。依着“后见之明”的看法，这要归功于耶稣会士们的“适应（accommodation）政策”^①，即耶稣会士们在中国没有采取“左手执剑，右手持十字架”的武力传教模式，而是穿儒服、读儒书、授西技、重会通，走和平传教的路子。然而从根本上看，“适应政策”的形成，绝非夙心早发、有意为之，其实是环境使然，是在克服困难中的产物，而其背后则是当时中西文化水平的势均力敌^②。传教士们选择了“入乎其内”之后著书立说的做法，而想“入乎其内”，则必须熟读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史子集，尤其是儒家的经书，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儒家“亚圣”孟轲成为传教士关注的对象。

最初，西人对《孟子》的译介仅停留于来华传教士的小圈子里，因此还不能说《孟子》已经漂洋过海，远赴泰西。虽然西班牙多明我会（Dominican）会士高毋羨（Juan Cobo，1546—1592）在以西班牙文翻译并于1589年出版于菲律宾的中国童蒙读物《明心宝鉴》^③（明·范立本编）中已经20多次提到孟子的言论，但由于发行规模小，且跟彼时在中国的传教士们殊少关联，所以影响不大。1591—1593年间，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1543—1607）、利玛窦（1552—1610）曾合作编译了《拉丁文版孔子语录汇编》，以之作为新来传教士学习高雅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辅助材料。此书其实是对《四书》的节译，并不限于“孔子语录”，其中第五部分就是《孟子》文本的拉丁文节译^④。这部译作并未正式出版，但一直被新来华传教士用作学习中文的教材。由于罗明坚和利

① 关于早期耶稣会士的“适应”政策，可参考〔美〕孟德卫（Mungello E. David）在《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与汉学的起源》一书中的精彩论述（陈怡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

② 朱维铮从中国历史内部剖析了耶稣会士“慢慢来”传教策略的形成原因，见其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导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译本题为 *Espejo rico del claro corazón*（Beng Sim Po Cam），为手抄双语译本；2005年马德里大学出版了该译本的校订本。

④ 此书共五部分，分别为《大学》《中庸》《论语》《中国古人就多种话题发表的论点汇编》和《孟子》。主笔为罗明坚，但包括《孟子》在内的大部分译文可能是利玛窦翻译的。此书手稿现收藏于意大利罗马中央国立图书馆，2010年春夏曾随“海峽儒宗——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文物特展”在中国巡展。

玛竇二人的先驱者身份，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理解遂成为西人解读中国思想的开创性范式，事实上，这一范式也融化、积淀到之后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的中国经典翻译与诠释之中。

《天主实义》^①一书是利玛竇假托“西士”身份对“中士”进行教理启蒙的中文著作，其中对《孟子》部分言论的释评就具有创立轨范的意义。《天主实义》引《孟子》“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之语，佐证“天主教生彼鸟兽，以随我使耳，则杀而使之，以养人命，何伤乎”之旨^②；称孟子倡“仁义”，以“王天下”为“利”劝行仁政，说明圣人亦言利害，进而说明天主教之重视“来世之利”方为“至大”“至实”之利^③；引述孟子“人性与牛犬性不同”之语，说明“人性”之善恶问题，本无关乎作为“依赖之品”的、恒善的“（天）理”，“性”与“理”不可混同，又引《孟子》“孺子将入于井”之例，说明性善作为“良善”与德善（“习善”）的区别^④。以上利玛竇之引述《孟子》观点，尽管其意图与《孟子》原文的论述出发点歧出，但尚不能说其为南辕北辙。然而，当论及《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语时，利玛竇则认定，“吾谓以无后为不孝，断非中国先进之旨”，并引《孟子》“求在我”“求在外”之区分，申论孝之与否，跟得子与否无关^⑤。利玛竇并不反对儒家的孝道，其容不得的是将“无后”列为最不孝，因为这势必将冲击敬奉上帝的优先性。以上种种，可证利玛竇于儒学有取亦有舍，而取舍之标准，则全视儒学观点是否可与基督教义接榫合卯。

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的《中国上

① 又名《天学实义》，初稿大约完成于1596年，初刻于1601年，1603年正式刊刻，后来又多次重刻，并译为日文和高丽文出版。《四库全书》将其收入子部杂类存目，《总目提要》谓其“大旨主于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释氏以求胜。”

② 《天主实义》第5篇“辩排轮回六道、戒杀生之谬说，而揭斋素正志”，见《利玛竇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4页。

③ 《天主实义》第6篇“释解意不可灭，并论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以报世人所为善恶”，见《利玛竇中文著译集》，第62页。

④ 《天主实义》第7篇“论人性本善，而述天主门士正学”，见《利玛竇中文著译集》，第73、74页。

⑤ 《天主实义》第8篇“总举大西俗尚，而论其传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释天主降生西土来由”，见《利玛竇中文著译集》，第90、91页。

古史》(1658)^①取材于中国正史,而辅之以西历纪年,欲借以沟通中西因相互独立发展而长期隔绝的“历史”。这部断代史虽也有将中国历史纳入旧约《圣经》编年史的用心,但卫匡国延续了利玛窦的适应路线,相对注意著述的科学性,由此对中国“上古”文明颇含同情,在论调上多有赞美,近于中国正史。此书记述了孟子的简单生平与思想,以及当时与孟子辩论的部分哲学家(第155—161、170—171页),认为孟子是一位“非常高尚和极有雄辩能力的哲学家”,并将《孟子》一书开头孟子与梁惠王讨论义利问题的对话简译为拉丁文。

而西班牙多明我会会士冈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1618—1686)虽跟卫匡国同时来华传教,但代表了迥异的传教路线。在《中国历史、政治和宗教论集》(1676)^②一书中,他激烈反对耶稣会的适应、同化路线,主张包括孟子思想在内的中国思想无法兼容于基督教信仰。卫匡国和《西文四书直解》^③的作者基于他们对《春秋》部分记载的理解,断定孔子已经预言了基督本人之降生以及基督教之传入中国,而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在《中国近事报道》(1696)^④一书中,也认同《西文四书直解》的看法,认为公元67年前后汉明帝“感梦求法”,其所梦之金人、白马本来即是孔子所预言的东来之基督教,只是由于明帝所遣使者的某个过失,结果阴差阳错,误把佛教而非基督教

① 拉丁文题为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res à gentis origine ad Christum natum in extrema Asia, sive magno Sinarum imperio gestas complexa*, 可直译为《中国历史初编十卷,从人类诞生到基督降世的远方亚洲,或中华大帝国周邻记事》。此书1658年在慕尼黑出版,1659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法译本1692年出版。

② 原题为 *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1676年在马德里出版。

③ 原题为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studio et opera Prosperi Intorcetta, Christiani Herdtrich, Francisci Rougemont, Philippi Couplet*, 或译为《中国哲学家孔子》。自题中文书名是《西文四书直解》,原因是译者们主要参考的是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但实际上《西文四书直解》只有《论语》《大学》《中庸》三书的翻译,并不包含《孟子》在内。编译者有意大利人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葡萄牙人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 1599—1666)、比利时人鲁日满(F. de Rougemont, 1624—1676)和奥地利人恩理格(P. Christian Herdtricht, 1624—1684)等耶稣会士,比利时人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总其成,并于1687年在巴黎(Daniel Horthemels)出版该书。

④ 原题为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696年出版于巴黎。